

# 从西方史学史到全球史学史

## ——评《全球历史的历史》\*

邓京力

《全球历史的历史》是继伊格尔斯的《全球史学史》<sup>①</sup>之后第二部讲述历史写作、历史思想以及历史学科全球发展史的著作。它以全景方式展现了从古至今来自不同历史传统和不同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的人们为揭示、理解与再现过去所做出的努力,并着重表明历史意识以不同形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不同历史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吸引我们的是,作者对目前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历史意识对于其他地区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做出了重新思考。

该书共分九章。第一章讲述公元1世纪以前世界各地出现的几种史学的起源,从4000年前的近东文明开始,那里产生了迄今所知的最早历史记录;而后转向创造了“历史”一词及其化身克利奥的希腊和古典文明的继承者罗马;接着阐述东方最古老的中国史学和特点迥异的南亚史学。第二章讲述公元第一个千年间的史学发展,包括希腊罗马史学在古典时代后期的发展、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史学的产生、西欧蛮族史学、东南欧拜占庭史学、伊斯兰史学、中国唐代史学、日本史学的开端等。第三章讲述1000—1450年的全球史学,着重分析在全球性动荡与战乱中,欧亚大陆内部各地区间及与外部的史学交流得到加强。第四章讲述近代早期(自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欧洲、中国和伊斯兰的史学,突出历史学对建立、巩固世俗政权或宗教权威的作用。第五章讲述1450—1800年美洲地区的史学发展,包括欧洲殖民者、当地土著、混血人对美洲历史的不同记录,以及北美史学的开端。第六章讲述18世纪欧亚启蒙时期的史学,探讨进步观念的出现及其对西方文明史元叙述形成的影响,兼论东西方史学之间的相互认识和影响,以及同一时期中日史学的状况。第七章讲述19世纪西方(欧洲与美国)的历史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科学化、实证主义等多种思潮的发展,以及最终史学专业化、职业化的完成。第八章讲述随着西方世界霸权的建立,1800—1945年欧洲史学对亚非拉地区及澳大利亚史学的影响达到顶峰。第九章论述20世纪史学的发展,从历史主义危机、相对主义兴起、社会科学化史学的出现等新史学现象,到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挑战。综观全书,沃尔夫试图通过对人类既往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知识形成的追溯,阐发一个多种来源、多条线索的全球历史学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体悟到如下几个方面的思想洞见。

---

\* Daniel Woolf, *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作者丹尼尔·沃尔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学教授。本文中的相关引文只标注原书页码。

①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一、历史产生之根源：一个全球性话语的世界

历史之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代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任何文化都存在着对于过去的态度，要么是以消除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来表明当前制度的永恒性，要么将历史进程内化于现在成为其发展的动力<sup>①</sup>。历史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我们不禁要问历史究竟因何而生？

通常认为今日历史学之产生与存在的根源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源于人类所具有的某种生物本能，即生物学与神经学意义上的记忆能力、组织记忆中事务的关系或象征性意义的功能；其二，源于人类的社会属性，种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依托其内部的相互交流与联系（第1页）。因此，有当代西方学者提出，从历史学产生之自然属性看，历史应是一种全人类共有的东西；历史又是一种意识的类属性形式，自我或他者的经历都会转变为符号在其所产生的地域之外进行相互交流。<sup>②</sup>这向我们表明，从史学产生的根源上看，它并非某种文明的专属，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存在；其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史学交流存在着某种必然性，是人类社会属性的根本要求。

在此基础之上，沃尔夫进一步指出，仅仅依靠记忆的能力并不足以使人类具备创造历史知识的条件，人类是唯一同时具有长时记忆和交流能力的生物体，前者使人类可以超越简单追忆短时目标，而后者可以使记忆、知识同其他人群进行有效的交换或传播（第1—2页）。从史学史上我们发现，文字化的交流方式在技术层面大大增强了对记忆信息的保存和交流，使其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但是，这种方式产生得相对较晚，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在此之前，人类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保存历史，目前我们所知的古代文化都留有用口头语言传递历史的实例，特别是以诗歌或民谣的形式传颂神灵和英雄的事迹。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书写是历史产生的先决条件，因而形成了没有文字的民族就不可能有历史的预设。但今天看来，通过口述、图像、符号来保存过去的形式与文本形式同样都是历史意识的表现方式。

## 二、“历史”之义：大小写历史之间

由于该书内容频繁涉及“历史”、“历史思想”、“历史知识”、“世界历史”等概念，因此作者需要对“历史”这个意义复杂的术语做出界定，以明确讨论的对象和范围。沃尔夫在导论中提出了“历史”的三重含义：其一，指对过去进行复原、思考、言说和记录的各种形式；其二，指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写作，由连续性的叙事构成；其三，指在近两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学科（第2页）。

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对“历史”概念的界定与以往常识不同的一点是将“历史”视为对过去的认识、叙述和制造，而非过去本身。因为在沃尔夫看来，“过去发生的事件”这一看似客观的表述却隐藏着历史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所预设的权力立场、意识形态、道德教化等主观意图，尤其是通过事件

<sup>①</sup> Claude Lé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pp. 233–234.

<sup>②</sup> Greg Denning, “A Poetic for Histories”, in his *Performanc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36.

累积的过程所展现的历史目的论。这一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历史”之义,由19世纪的黑格尔到20世纪末的福山所继承,逐步构成了一种主流的现代历史观念。在该书中,当作者讨论到这种意义的“历史”时,都使用了大写历史(“History”)以区别于小写历史。小写历史既包含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专门化、职业化的历史学对过去所进行的系统认识,同时也包含所有对过去思考或陈述的形式,并不仅仅是现代西方所独有的(第3页)。

在这种意义上,从大写历史中区分“历史”就意味着要从西方的元叙述中拯救被淹没的、被排除的、被有意规避掉的、非西方的历史意识和史学传统,呈现他们对历史的言说、思考、记录、叙述。这一做法显然受到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影响,然而让作者比较难于把握的是,一方面,小写历史本身在整体上也许并不具有同质性的意义,而且不同文化之间相关联内容的可比性也是极具争议的;另一方面,大写历史通常会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小写历史之中,二者之间总是表现出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相互交错现象。

### 三、“历史编纂”:通往过去的路径

鉴于当前史学专业化教育中对“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概念实际使用的歧义状况,作者首先归纳出三种流行的基本含义,并据此说明该书在每个方面的不同立意(第4—7页)。第一,指对历史方法的研究。该书较少使用这种用法,即使作者会讨论到某些历史方法的发展,但这并非他要涉及的主要内容。第二,指对某个国家地区、分支学科或历史事件的认识状况与主要争论的回顾和研究。该书也很少使用这种用法,因为作者所要论述的范围与以往传统的西方史学史不同,是要从全球出发来考察历史写作与历史思想的发展,他必须从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西方史学为中心的视域中跳出来,将所有文明的史学传统都纳入进来。因此,他必须打破传统的“历史编纂”观念,提出新的“历史编纂”观念。第三,指历史写作的历史。通常包括对伟大历史学家及其文本的研究,有时也会扩展到考察非权威性著作及其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

在审视上述三种“历史编纂”定义的基础之上,作者指出在过去某些文化中还自然生成了另外一种对“历史编纂”的认识,尽管这种用法在现代西方语境中已经过时,但仍可构成“历史编纂”的第四种定义,即同时指记录历史和史学发展的两个方面(第5页)。该书实际使用的“历史编纂”概念主要是指历史写作和历史思想的范畴,但相较于第三种和第四种定义,所囊括的范围更加广泛,包含各种人(并不仅仅指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史家)对过去的复原与再现。同时,它所依据的也并不仅仅是那些成文的、印刷出版的、现代意义上的史料。因此,作者在书名中有意避免使用“历史编纂”概念,也没有将其限定为《全球历史写作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而是选取了更为宽泛的用语《全球历史的历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作者的立意在于以叙述的形式探究那些通往过去的路径,也包括某些不同于成文历史的对过去的见识(第5—6页)。

### 四、现代历史学科之形成:西方史学史的塑造

所谓现代历史学科至今已有150年以上的历史,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专业化规则,并为学科

共同体长期遵循。作为一个拥有国际化规范的职业团体,历史学的自我省察与自律机制始终都在竭力维护着本学科的合法地位。今天当我们回溯历史学科的兴起之路时,就会发现这条道路的形成绝非偶然,而且在以往的西方史学史著作中其轨迹亦清晰可辨。

从20世纪初至今,以乔治·古奇、哈里·巴恩斯、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厄恩斯特·布莱萨克、唐纳德·凯利、迈克·本特利等为代表撰述的各种西方史学史著作,向世人展示了从修昔底德到汤因比、从古代的编年史到现代的年鉴学派,从文学、经院哲学、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的历史学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历程,其终点是现代西方史学模式的产生与成熟。无疑,在上述现代历史学发展的谱系中欧美史学占据着绝对的中心地位,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是有关伟大历史学家及其经典性历史著述的研究。同时,在某些西方史家看来,虽然其他文明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过对历史的认识,尤其像中国在文献考证和史料批判方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们都没有产生过如西方意义上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写作。<sup>①</sup> 因此,沃尔夫指出这类史学史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普遍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与线性史观,二是带有“只有西方才能产生真正的历史意识与史学”的预设(第13—14页)。对于前者,全球史学史的研究恰好需要大力探究以往被西方史学史研究者所忽略掉的那些多线的、非精英的、非主流的、非现代性的、非西方的历史意识和史学发展状态,并以此来质疑有关现代历史学发展史的元叙述的合法性。对于后者,则需要新的跨文化交流的语境下,重新反思是否只有西方、只有现代性才能产生所谓“真正的”历史。

## 五、二元分析范畴的运用:西方与东方(非西方)

沃尔夫在书中为了叙述的方便继续沿用了西方与东方或西方与非西方的概念,但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使用这类术语本身就隐含了欧洲中心论的标准(第14—15页)。因为它们是以西方为参照系的,而且,还将不同文化的差异抽象性地归于一个二元对立的范畴,并以非此即彼的规定性有意排除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与共性。实际上,西方与东方(非西方)之间的边界是相对的和模糊的。

“欧洲中心主义”在世界历史和史学史的编纂中预设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宗主与附属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范畴。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沃尔夫提出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即这些二元对立范畴的形成绝不是西方单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西方史学在以往同其他类型史学的相互碰撞和交流中,通过不断渲染其新的方法与理念,标榜自身的成就与进步,同时掩盖内部的矛盾与质疑,最终在19世纪完成了一个优越、自信、成功的史学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其他地区(东方或非西方)也在双方的互动交流中不断将代表现代与进步的西方史学引入进来,并试图以此取代本土传统。但实际的结果是,欧洲史学实践的模式不可能被一成不变地移植到异域社会中。大部分地区都对西方历史知识的形式进行了必要的改变,以求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第15—16页)。

但是,20世纪的史学史写作基本上排除掉了西方与东方(非西方)谋求相互交流与变革的内容,

<sup>①</sup> J. 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13, 20—21.

甚至有的西方学者拒绝承认非西方地区在与欧洲接触之前有自己的历史。<sup>①</sup>可见,在西方与东方(非西方)这类二元对立范畴中隐含的是历史意识的一元论,其中暗含着对世界其他地区历史意识存在的否定性认识。这一点强烈地提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学史只有在建立平等对待所有文明遗产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成。

## 六、全球史观与史学史研究的转向

全球史观对传统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而言,在观念层面上意指摒弃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及其写作模式。但在实践层面,如何使全球史学史的撰述成为可能,如何具体展现历史写作与历史观念在全球各地区的动态变化过程,又如何从根本上将历史意识从西方现代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使不同路径的历史思考获得其在全球史学史中的应有地位与价值,仍是史学史编撰中的难题。<sup>②</sup>

在该书看来,全球史观首先意味着必须承认世界上的不同文明都已经孕育出各自不同的历史表现形式,构想出不同的通往过去的路径,发展出不同的历史观念、范畴及术语,因而都具有其自身的价值,需要运用它们各自不同的标准加以衡量,而不是以所谓的现代专业化史学标准(实际上是西方标准)来加以评判(第7页)。另外,全球史观也意味着不能以孤立的观点看待这些不同的历史表现形式、史学传统和观念体系,认为它们之间是相互隔绝的。正如世界历史已被看作一部不同人群之间相互碰撞、冲突的发展过程一样,史学史本身也证明人们对过去认识的不同模式之间是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更为重要的是,西方模式与非西方传统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仅仅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单方面影响。我们经常看到,当西方模式在异域取得主导性地位之后,也会反过来受到当地历史知识传统的深刻影响(第8页)。这就需要以开放、互动的观念看待世界历史上产生的不同史学传统,多向度地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使之成为史学史研究的新主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前由伊格尔斯等人撰写的《全球史学史》主要是以一种平行叙述和比较的方法展现了西方、穆斯林世界、印度、东亚世界的不同史学传统从18世纪以来各自的内在变化与相互关系。这一写法尤其突出了历史意识与历史写作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方向性的根本变化,同时也是基于其作者认为从18世纪末开始各种历史思想传统才有了相互间的影响,“而在那以前,这些历史思想传统的存在如果说不是完全的相互隔绝,至少也是相对的隔绝”。<sup>③</sup>与之相比,沃尔夫这本书的内容和写法显然有较大的差别。

首先,沃尔夫用一半的篇幅讲述了前现代时期不同地区历史话语的形成及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这意欲表明,历史意识与历史思想在全球范围的多元性发展和相互接触、碰撞、交流的发生不是现代以后才出现的,而是可以追溯到更早。如果完全抛开前现代部分,只是从现代史学的发展看,那么西方史学模式就会愈来愈成为现代专业化史学的代名词。因此,沃尔夫强调全球史学史的编纂并

① Hugh Trevor-Roper, *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5, p. 9. 此书宣称,在欧洲人进入非洲之前,非洲的大部分历史是模糊和不为人知的,因此现在只有欧洲人的非洲史,而没有他们自己的历史。

② 对该问题的讨论可参见邓京力:《史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史学比较与全球视野》,《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

③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3页。

不意味着简单地把亚非拉的内容添加进来,而后仍将其视作从各个方向汇聚而来的“涓涓细流”,并最终又“神奇地”融入单一化、均质化、标志着进步与成功的现代西方史学范式之中。或者在非西方史学中寻找西方模式的影子及对应物,并暗示他们的起源与归宿都不可避免地是现代西方史学模式(第9—10页)。这种看起来包罗万象的史学史,尽管也囊括了世界各地的历史写作与历史思想,但却依然难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

其次,全球史学史的编纂并不意味着要大量采用平行叙述的方法,只是表象性地展现平等对待多元历史文化传统并尊重其应有价值的全球史学观念。如果仅仅简单地平行罗列东西方或其他各个地区的史学,那么很可能会失去认识全球性整体图景和多种历史表现形式共生的视角(第10页)。显然,这种叙述方法实质上不利于创作出真正具有全球性视角的史学史,相反,可能会起到消解作用。正如麦克罗·西格尔所说,潜藏于任何世界历史叙述中的矛盾即在于其叙述方案本身。<sup>①</sup>该书在部分内容的叙述中采用了一种点描式穿插的写法,有些类似于绘画中的点描画法(pointillist approach)。大体是选择一些具有全球意义的史学史事件、现象、人物或事物集中进行聚像性描写,借此达到以点带面、逐步呈现整体轮廓的叙述效果。

另外,在全球视角下西方史学模式不再被视作衡量其他地区史学的标准,而仅仅作为一种“地方化的欧洲史学模式”<sup>②</sup>。沃尔夫更为关注的是西方史学模式为何与如何被其他不同文明有针对性地加以选择与利用,而作为“胜利者”的西方又是在某种程度上为“被征服者”所影响和改变的(第18页)。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简单地将西方对其他地区的影响视作历史学科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源动力是错误的;欧洲不应仅仅被看作输出的一方,其史学传统的传播是殖民扩张以及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转型的结果,西方史学在影响其他地区史学研究的同时,自身也在改变。<sup>③</sup>

总之,沃尔夫试图以一种新的全球性视角讲述一种不同类型的史学史。他所采取的应对多种史学传统的写法是交错描述与平行叙述相结合,使它们尽可能以多元、多线、多样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幅充满复杂线条与色彩的史学史画卷中,我们所看到的是通往过去的不同路径与解释过去的不同模式,它们具体反映在不同的历史表现形式中,又同时在各地区和各国家的交流中被传播,在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多重语境中被重新塑造。

(作者邓京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100089)

(责任编辑:董欣洁)

(责任校对:吴英)

① Micol Seigel, "World History's Narrative Problem",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4, 2004, pp. 431–446.

②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History, Plur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raditions", *New Global Studies*, Vol. 3, 2009, pp. 3–4; Roxann Prazniak, "Is World History Possible? An Inquiry", in Arif Dirlik, Vinay Bahl and Peter Gran, eds., *History after the Three Worlds: Post-Eurocentric Historiographie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0, pp. 221–239.